



中国百名经济学家 理论贡献精要

ZHONGGUOBAIMINGJINGJIXUEJIALILUNGONGXIANJINGYAO



[第二卷]

张卓元 周叔莲 吕政 汪海波 宋灵恩◎主 编



中国百名经济学家 理论贡献精要

ZHONGGUOBAIMINGJINGJIXUEJIAELUNGONGXIANJINGYAO



[第二卷]

张卓元 周叔莲 吕政 汪海波 宋灵恩◎主 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二卷)/张卓元等主编.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221-997-7

I. 中… II. 张… III. 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研究—中国 IV. 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617 号

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二卷)

张卓元 周叔莲 吕政 汪海波 宋灵恩 主编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乙5号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话	(010) 68320825(发行部) (010) 88361317(邮购)
传真	(010) 68320634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375
印数	1~5000册
字数	306千字
定价	45.00元
书号	ISBN 978-7-80221-997-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CONTENTS

· 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 ·

黄范章	1
汪海波	10
何 伟	27
张卓元	40
杨圣明	49
王梦奎	58
田雪原	67
陈栋生	82
谷源洋	89
陆百甫	100
陈佳贵	111
郑新立	120
吕 政	128
常修泽	139
刘树成	152

汪同三	159
洪银兴	168
金 碚	179
贾 康	188
迟福林	197
魏 杰	208
王广谦	217
蔡 昉	227
李维安	237
王东京	245
芮明杰	254
周天勇	266
张维迎	275
陈东琪	284
杨瑞龙	295

HUANGFANZHANGJIANJIE

黄范章简介

黄范章，1931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祖籍江西宜黄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顾问。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后，经统一分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初期几年，受命研究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后，开始研究经济思想史，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1980~198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送并获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得以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及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进修和作学术考察。1982~1985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后经中国人民银行借调赴美担任国际货币基金（IMF）执行董事（1985~1986年），旋即应聘担任美国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7~1988年）。1988年回国后，进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1988~1995年）。1985年由国务院学术办公室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此外，黄范章曾受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之聘，不仅担任全国委员会委员，还专任 PECC 经济专家组中国代表（1992~1996年）。历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亚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荣誉理事，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等职。

HUANGFANZHANGDEJINGJIGUAN

黄范章的经济观

黄范章自195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便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初期被安排研究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但个人兴趣则是研究国际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末孙冶方主持经济所工作并让黄范章致力研究经济思想史后,西方经济学史的丰富文库,大大开拓了他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先后在国外的几年进修、考察与工作,使他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及理论有更多的了解,不仅研究领域扩至比较制度及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等多个领域,更重要的是深刻地领会到个人研究必须以中国的实际作为出发点及归宿点,必须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作为学习、借鉴、研究的基本准则。现将黄范章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作一简扼整理。

一、主张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并进一步认为基金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是比国有制(实是政府所有制)更好的公有制形式

黄范章1988年回国后第一篇文章《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①,认为股份制特点在于它有四个“分离”: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二是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相分离;三是股票的面值与市场价格相分离;四是股权和企业产权的分离。特别是股权与产权的分离,决定了一般中小持股者(股民)只是资本集中的对象,只有大股东才是资本集中的主体,才是企业的支配者和所有者。这决定了股份制不仅资本主义所有制可以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可以用。

股份制是贯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不只是一个“归属”问题,而要靠一系列机制来确保其在各主要经济过程中得以贯彻和实现。我国国有企业虽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则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我们的国家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拥有

^① 《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

企业)，“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各自遵循的运行规则也不同。作为“政治实体”，其经济支柱乃国家财政，一向遵循“无偿征收、无偿拨付”原则行事；而作“经济实体”则应遵循“等价交换”、“成本—收益”经营原则行事。在“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合二为一的国家体制下，经济服从于政治，经营原则被“无偿调拨”的原则所取代，经济手段被计划化、行政手段所取代。这个“政企合一”的体制是新中国成立时从苏联那里学的，最适合于计划经济；要转入市场经济，就必须将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跟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分开，贯彻“政企分开”，而股份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适合改革国有企业的好形式。

不仅如此，该文主张为了把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跟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政府）分离开来，主张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层的管理体制^①。这个国有经济体系对各级“人大”负责，不受政府干预。此外，该文还提出发挥公共基金（如社会保障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教育基金、科研基金等）的作用，使之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持股者，用基金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取代政府所有制。依靠股份制经济的发展，就能给社会主义公众提供“生产者主权”、“投资者主权”以及“消费者主权”等机制，确保公有制企业成为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②。黄范章的上述观点和主张，不久被海外学者称为“基金社会主义”（Fund Socialism）或“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 Socialism）。

1989年，国内学界还陷入“承包制”、“股份制”之争，股份制还曾被一些人说成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企业形式。黄范章一直坚持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好形式；等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后，有的学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股份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甚至认为西方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也属“公有制企业”，他又撰文批评这一理论混淆。

① 《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

② 《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

二、力倡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为世界经济文库增添新篇章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以它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历了几百年，而旷古未见、旷世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探索中建立才20多个春秋，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路还很长。黄范章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特征”至少有四点：

1. 最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经济制度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不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关键是作为这个基本制度的核心部分的“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近百年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一致断言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破除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思想枷锁，提出二者可以而且应该相结合，并在实践中不仅找到“结合点”——改革国有企业，而且找到了“结合”方法，“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其间“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最为关键。这一改革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把国有企业建成市场经济所须臾不可缺“微观经济基础”。

所谈“公有制为主体”，既摒弃公有制一统天下的传统体制，也不是要求公有制经济须在国民经济（或GDP）中占多大份额，而是指国有经济须控制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中包括少数重要经济性、竞争性行业（如银行、交通运输、通信等）。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即拥有一批经营性竞争性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它们履行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靠政府财政补贴来支持，黄范章把它们称为财政账户类项目国企；二是经营性、竞争性国企，它们应以赢利为目的，会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及盈亏核算，黄范章把它们称为资本户类项目国企。前者应由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辖，谈不上“政企分开”，后者应贯彻“政企分开”，须在政府之外确立一个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如“人大”），由新型国资委统辖经营性竞争国企，对各级“人大”负责，并受各级政府监督。对一般经营性、竞争性国企来说，重要的是资产保值增殖以及便利地进入和退出机制，哪里有市场就把资金投

向哪里。但对某些重大领域的经营性、竞争性国企（如银行、航空、通信等）讲，由于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战略地位，决不可因别人（私企或外企）出高价而退出。

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基本国情，它的创建与成长都贯穿于“三重转轨”交织在一起为特征的转轨时期，这“三重转轨”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向新型工业经济体转轨；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进而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性型转轨。这“三重转轨”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所完成的事，其复杂性和艰难性可想而知。这些问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从不研究的。

4.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经济发展、经济改革，还是“三重转轨”，都由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性几乎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赶超”型经济中一个共同特点。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像韩国虽建设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政府为大型私人集团操办向外借贷，结果招致金融危机而受损。中国更应引以为戒。中国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经济实体”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这些年虽在“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仍“藕似断而未断，丝更缠绵”。上海社保基金弊案以及房地产市场乱象表明，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及双重职能，不仅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制度根源，而且影响政府难以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还成为官商勾结、贪污迭出的源头，若任其滋长，势必成为“权贵资本家”或“新型官僚资本家”的“温床”。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身上。相信再过 30 年，我国“三重转轨”完成之日，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学完成之时。

三、对一个所谓“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的传统理论观点，重新审议

过去之所以提出要对这个传统理论观点重新加以审议，理由有三：

1. 它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符。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出现“公有”因素，不再是私人产品一统天下。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后出现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分野后，出现有“公共产品”、“公共服

务”等范畴。如果说,铁路、高速公路之类“公共产品”尚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部分,但20世纪50~60年代“公有”因素已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部分渗进,在金融业有一批机构投资者发展起来,特别是其间最大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基金,此外还有“共同基金”(或投资银行)。它们的资金来自广大参保者(养老金基金)和投资者的储蓄和投资。这两家机构投资者应视为这两个群体所持有,蕴涵一种可称为“共同所有”、“公众所有”或“社会所有”之类的“公有制”因素。

黄范章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初提出的用“职工投资基金”逐步取代大企业私有制的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执政期间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虽距离该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尚遥远,但“职工投资基金”已累积了一笔可观的“公有”资产。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已出现了“公有”因素,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

2. 前述传统理论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相悖。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认为,新的生产关系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在旧任内自发地萌发、成长和壮大,并且反过来会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这是一项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用这个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发展就不再适用,断言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萌发出来。从而使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则就此中断。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公有”因素这一现实,表明传统观点过于武断,背离了自己所声称尊重的历史唯物主义。

3. 传统理论观点与时代潮流有悖,因它与“暴力革命”、“世界革命”密切相关。它断言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萌发,无产阶级不仅要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且必须靠暴力“剥夺者”以建立公有制。这个观点,过去在理论界支配了大半个世纪,主要因为当时我们对时代的认识,长期囿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时代”。当年苏联恪守这个信条,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搞“革命输出”,结果害人害己,导致自身亡党亡国。而今物换星移,时代变了,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而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了当今时代的最强音,这应是指导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指导方针。我们应该摒弃“暴力革命”、“世界革命”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寄希

望于“和平与发展”。

黄范章是2002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一个传统理论观点重新审议》一文中提出上述观点的，后来在《瑞典：剖析与借鉴》及《股份化、社会化的思考》，均有进一步阐述。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信息的网络把世界各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使各地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另外也带来与之俱来的弊端，经济全球化了，各种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了。过去，西方各国遵循凯恩斯主义依靠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几十年间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再度袭击。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光靠自身的宏观经济管理也难以自保。要在全球范围实施统一的超国界的宏观经济调节，简直是痴人说梦；要在地区内实施统一的超国界的宏观经济调节，也不可能，欧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有了统一的欧洲银行和欧元，至于统一的财政政策，尚遥遥无期。在此情况，唯一的选择，就是各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以共同对付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黄范章在1998年底发表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监国际化》^①，他不仅主张加强金融监管，而且呼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必须国际化，即国际合作。2002年他又进一步提出经济全球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并指宏观经济合作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而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确立的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伦敦会议之后，黄范章写出《经济全球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一文，呼吁二十国集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不仅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所必需，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说1985年少数发达国家的财长、央行行长签署“广场协议”，只意味着对世界经济的秩序的“突破”，那么，二十国集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将标志着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秩序的孕育和

^① 《宏观经济研究》创刊号，1998年12月。

胚胎。

五、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在东亚地区营造和平环境至为重要

黄范章研究东亚地区经济形势格局，提出中国在地区面临着一个由大（中国、日本、美国）、中（中国、东盟、“四小龙”）、小（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三个三角关系形成的格局。这三个层次主要是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以及我国分别与它们有不同程度的互补性与竞争性提出的。而且也考虑了中国与他们的政治战略关系。在这一个分析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立足小三角、争取中三角、周旋于大三角之间”的战略设想，稍后又进一步提出“抓两头、带中间”的策略思想，即着重处理好“大、小”两个三角关系，就可以带动中三角的互助合作关系，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营造一个和平、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这个观点一发表，便引起日、美学者的高度重视，黄范章于 1992 年被日本三井物产集团公司经济研究所邀请在东京帝国饭店就此专题发表英文讲演，1993 年还应美国 Bundy 教授之邀为他主编的《环太平洋地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Rim》）提供论文。

六、长期关注对两岸关系的研究

2004 年，黄范章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分三步骤的“两岸和平统一路线图”的设想：一是两岸认同“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二是通过和平谈判达成以台湾放弃“独立”、大陆放弃使用武力为核心内容的“和平协议”；三是通过 20~30 年经济合作与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制度互相磨合，实现政治统一。他的这个“两岸和平统一路线图”有以下几层含义：1. 关于“九二共识”，过去大陆侧重于“一中”原则，台湾方面则侧重于“各表”原则，其实“九二共识”最实质意义在于申言：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一国”原则；2. “反独”、“统一”分两步走。在两岸和平协议签订以前，“反独”将是两岸人民共同任务，因为“台独”是破坏两岸和平的“定时炸弹”，不排除这颗“定时炸弹”，台海地区将永无稳定、持久的和平；3. 贯彻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全过程的是用经济的合作与融合来推进政治问题的解决，在两岸和平协定签署以前的“反独”阶段是如此，在

和平协议签署之后“谋统一”阶段也是如此。“统一”阶段也许要比“反独”阶段更艰巨些。内地方面将坚持“一国两制”，台湾方面也许提出“统一在民主制下”。但两岸长时期经济融合和政治的磨合，“统一”终将水到渠成。他提出的“两岸和平统一路线图”最早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4年6月号，后来还有进一步发挥。

黄范章还积极参加国外重要学术活动。例如，他1994年连续4年均应“世界经济论坛”之邀以专家身份赴瑞典达沃斯参加一年一度的年会；从1991年起连续6年以专家身份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出席每年在大阪和旧金山举行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研讨会。从1990年和1991年起，黄范章的名字及简介分别刊载于伦敦欧罗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名人录》和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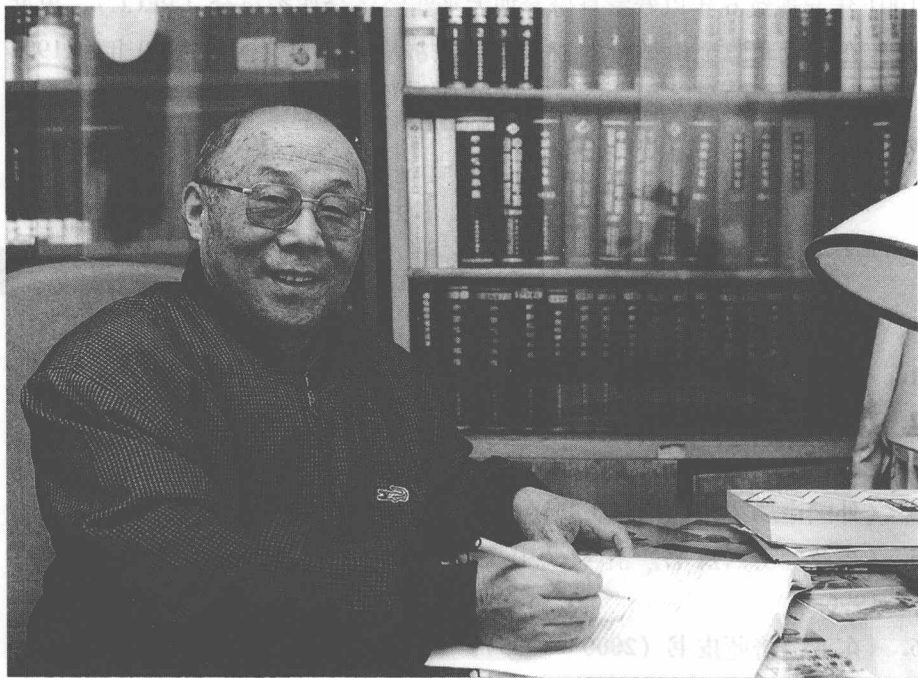
ZHUYAOZHUZUOMULU

主要著作目录

1. 《黄范章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
2. 《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国际环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外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主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
5. 《东亚经济白皮书》〔与弘中喜捷（日）合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
6. 《东亚经济蓝皮书（2000~2005）》（与魏燕合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WANGHAIBOJIANJIE

汪海波简介



汪海波，原名，汪期涛；笔名，汪涛。1930年9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县龙坑汪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36~1944年6月在宣城县龙坛坑和榨门口读私塾和小学。1944年7月~1947年6月在宣城县立初中毕业。1947年7月~1950年6月先在安徽省宣城中学读高一、芜湖中学读高二，后在皖南区宣城中学高中毕业。1950年7月~1953年6月先在南京大学经济系读大一、大二，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53年7月~1956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1956年8月~1958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助教。1958年12月~1975年12月在中国科技

大学政治经济教研组先后任助教、讲师和组长。1975年12月~1981年1月在人民出版社经济编辑室做编辑工作。

1981年1月~1995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其间,1981年任副研究员,1985年任研究员。1982年任硕士生导师,1985年任博士生导师。1981年任工业经济理论和发展史室主任。1985年7月任所党组成员。1985年10月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1984年9月任经济管理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和《中国经济年鉴》副总编辑。1986年7月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1987年4月任《经济管理》主编。1988年11月任《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1987年8月~1991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还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学位委员会主任,院学报主编。1987年、1989年、199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学科片学术委员会委员。1995年10月在工业所退休。

2006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荣誉学部委员。1995年10月至今,继续任《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并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兼职教授、教学顾问。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论文奖”;中国企业家协会颁发的“金三角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科研成果一等奖”;《光明日报》“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第五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以“表彰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WANGHAIBODEJINGJIGUAN

汪海波的经济观

1956年夏,汪海波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他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展研究工作。1957~1963年,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届毕业生周叔莲(当时他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合作。在全国

性报刊〔《光明日报》、《大公报》（《经济日报》的前身）和《经济研究》以及有全国影响的地方刊物《学术月刊》、《中国经济问题》和《江汉学刊》〕发表过多篇文章。自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起，“左”的路线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顶点。所以，从1963~1976年，汪海波也就完全停止了研究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他同周叔莲、吴敬琏3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在1977~1978年的拨乱反正期间，三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财贸战线》（《经济报》的前身）、《经济研究》和《学术月刊》、《中国经济问题》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集中批判了“四人帮”在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工资、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和知识分子等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至此，汪海波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辟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这时起，汪海波在研究工作中自觉地遵循这条思想路线，并围绕这个主要特征满怀激情地开展了工作，对我国经济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研究

1.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研究。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企业生产目的的探讨》、《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目的的探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症结何在？》等论文中，汪海波并没有拘泥于当时流行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笼统地归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是依据企业的所有制情况做了具体分析。比如，他认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本企业劳动者的生活需要。还提出，仅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充分实现，还必须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2.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在《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论文中提出，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企业的自动调节。为此，要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独立经营者，要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该文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涉及

了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

3. 关于产业后备军的研究。在《关于我国现阶段产业后备军的若干问题》论文中，汪海波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将产业后备军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范畴的片面性，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必然而且还需长期存在产业后备军。并据此提出，要积极进行相应的包括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还要把调控失业率作为一项全新职能列入政府宏观经济调控。

4. 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专著中，汪海波针对“四人帮”对脑力劳动的污蔑以及1958年以后多年存在的“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做法，不仅强调了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是生产劳动者，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脑力劳动者也是生产劳动者；还着重提出无论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或其消灭，根本的决定因素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5. 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专著中，汪海波系统地揭示了国有经济中生产资料补偿基金、劳动报酬基金和剩余产品基金的性质、量的规定及其分配过程。

6. 关于积累和消费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专著中，汪海波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的根本特征、比例关系及其模式。特别是依据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自己在这方面构建的分析框架，即综合分析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城乡人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和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这三个因素，以确定积累率，推算出20世纪最后20年的积累率。鉴于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即产量（收入）增长率（G）= 储蓄率（S）/ 资本产出率（C），既有科学性也有局限性（忽视了原有生产基金利用效率提高在产量或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汪海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将这个经济增长模型拓展为：国民收入增长率 = 积累率 × 积累基金效率 + 原有生产基金效率的增长率。

7. 关于经济效益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效益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效益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研究》和《工业经济效益问题探索》等专著中对经济效益问题做了相当完整、系统的研究。汪海波认为，其特点是：第一，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经济各部门（除了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以外，还包括科技、教育和卫生部门）、